

一、以法统方

综观“新方”，不难看出景岳重视“以法统方”。这不仅表现在将“新方”类分八阵，在具体遣药组方上还强调“法贵合宜”。《新方八阵·八略》谓：“药不执方合宜而用，此方之不必有也。方以法立，法以制宜，此方之不可无也。”说明景岳讲究组方一定要合于法度，不合法度的组方没有实际用途，不如无此方。

另外，还提出组方必以一定治法为指导，要“法以制宜”。如何做到“宜”，景岳谓之必先“明理”。所谓“理”，就是其所概括的辨证方法，即“两纲六变”。“明此六变，明此阴阳”，“则天下之病固不出此八者”，由此适见其“明理”之重要。理明即可以理统法。也就是先从“两纲六变”分析归纳证候，而后制定对证之法，于是乃有法之八阵，即补、和、攻、散、寒、热、固、因。八法既立，于是众方归类。最终以方执药，于是方乃成。

在景岳看来，制方的功夫、学问不尽在方中，似尽在方外，这也是他的论治思想。如《景岳全书·论治篇》云：“天下之病，变态虽多，其本则一，天下之方治法虽多，对证则一”。只有理法方药融贯为一，所制之方才能对证，才可达到“精一”，治疗才为“至善”。“以法统方”原则，堪视作景岳制方总则。

二、药贵功专

景岳制方讲究方的功效精专。“与其制补以消，孰若少用纯补，以渐而进之为愈也；与其制攻以补，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”（《景岳全书·论治篇》）。由此可见，景岳一般不主张补消并用、攻补同施。“用治不精，则补不可以治虚，攻不可以去实，鲜有不误人者矣。”（同前）景岳的这一主张，见之于八阵诸方。现姑以“补阵”为例，所制补方凡29首，用药

浅析景岳“新方”制方特色

450003 河南中医学院 马照寰

主题词 张介宾 ①《新方八阵》 中药配伍

精纯的方例俯拾皆是。如“举元煎”，为治气虚下陷、血崩血脱、亡阳垂危等证而设，方用人参、黄芪、炙甘草、升麻、炒白术。本方乃从东垣补中益气汤化裁而来，嫌当归之辛柔、恐陈皮之耗气、厌柴胡之左升而皆去之，所余之品堪称药精功专，以此冀收补气举陷、摄血之捷效。再如“贞元饮”，为疗短气、气急、虚喘而设，方用熟地、炙甘草、当归，药仅三味。气急短气，临床见证颇为复杂，景岳唯恐此方用泛，谓适应证乃是“元海无根，亏损肝肾”，渐为气脱，脉当微细无神，甚则脉微而兼紧。据此，其病机当为精血两伤，命门之元阴涸竭。故重用熟地多达一二两，大补元精，辅以当归、甘草养血益气，俾使元阴得滋，气方化生有源，短气气急方可期以平复。此为精中求气之治法，方之精纯于此可见一斑。

景岳主张一般“补不必兼行，寒不必兼温，若兼而用之，似称周备，究为治本，抑或治标”，故其制方遣药效精专。

三、方贵简洁

“新方”186首方中，在11味以上的仅为13首，且多为丸、散、膏、丹，仅为总数的7%；组方在5味以下的有58首，占总数的30%；在6~8味之间者，占47%。“新方”平均药味仅为6.5，表明景岳制方重简洁、恶冗杂。

如“秘元煎”，为遗精带浊等病而设，专主心脾，治久遗无火而滑者，方用远志、山药、芡实、枣仁、白术、茯苓、炙甘草、人参、五味子、金樱子。此由水陆二仙丹

合四君子汤加味而成，药虽10味，然方意简洁明快，结构清晰可辨。此方治遗精带浊，并未汲汲于补肾固摄，而从宁心益脾选药，俾使神安而精固，脾运复而化源得培，辅以涩精固肾之品。此诚为久患带、遗致虚之良方，毫无冗杂之嫌。

又如“五物煎”，主治妇女血虚寒滞、蓄积不行、小腹痛急者，方用当归、熟地、芍药、川芎、肉桂。方乃四物汤加味而来，方药构成精当纯净，是以补虚为主、温通为辅，较之四物汤虽仅增一味，然灵动化凝之性却跃然明晰。

再如“决津煎”，乃为妇女血虚经滞不能畅流而痛极者而设，证为虚实夹杂，方用当归、泽泻、牛膝、肉桂、熟地、乌药，亦可见制方者的简洁用意。按景岳制方本极主张功效精一，然遇夹杂之证，“若必不得已，而用行中之补，补中之行，是势所当然”（《景岳全书·论治篇》），并不拘泥刻板。即如本方所主之证，单攻其实恐伤其正，只顾及虚又碍及实，值此之际只好兼而施之。当归、熟地相伍，补血润经，助其流畅；当归、牛膝活血通经，以决壅滞；肉桂、乌药温寒散凝，以畅其血气；酌入泽泻以导引入肾，且能利水防其湿聚为痰更碍其淤。故本方补而不滞、活血不峻，可增津血、可通壅淤，是为治虚中挟滞之痛经常选之方。

景岳制此类方是基于不管品味多少、性味异殊，若“合其用，自成一局之性，使能会其一局之意”（《景岳全书·论治篇》）。这种指导思想本师法东垣，以效其治方

仲景对豆豉“清宣”的妙用

210029 南京中医学院 陈仁寿

主题词 《伤寒论》 黑大豆/治疗应用 泻热

豆豉即淡豆豉,《伤寒论》又名香豉,为豆科植物大豆的种子经蒸霉加工而成的制品。其味辛,性微温,入肺、胃经,具有轻清宣泄作用。《本草汇言》载:“此药乃宣郁之上剂也。凡一切有形无形,壅胀满闷,停结不化,不能发越致疾者,无不宣之。”张仲景于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中以豆豉选用不同的配伍,组成栀子豉汤、栀子甘草豉汤、栀子生姜豉汤、枳实栀子豉汤、瓜蒂散共六方,以治疗心中虚烦、痰涎宿食、黄疸、劳复等。从以上六方及主治症可以看出,仲景用豆豉无不取其“清宣”作用,使病邪宣泄而去,以达到治病的目的。现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分述之。

一、清宣以泄热解郁

之长,与寒温混用、攻补杂投者绝然不同。此景岳所谓“冗中求简”,“冗”,指品味似冗;“简”,谓合方后协和互济,共为一局,疗效专一。修园贬之为“不知实者得此为实实,虚得此为虚虚”,其评失偏颇,语欠允当。

四、燮理阴阳,取意于化

景岳对阴阳学说的研究甚精,指出“阳为阴之偶,阴为阳之基”。二者可分又不可离,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。更为可贵的是,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《难经》的“命门”说,谓命门为阴脏,“命门总主乎两肾,两肾皆属于命门”。精藏于命门,气化于命门,总操藏精化气之职。基于此,景岳在论治与制方上均提出自己的创见,即“善

邪热郁内、胸胁不畅,则可致失眠、心烦诸症,用豆豉轻清宣郁,可使郁热之邪而去,心胸得畅。如《伤寒论》第76条云:“发汗吐下后,虚烦不得眠,若剧者,必反复颠倒,心中懊恼,栀子豉汤主之。若少气者,栀子甘草豉汤主之;若呕者,栀子生姜豉汤主之。”以上三方均以栀子、豆豉为主药配成,所治主症为“心中懊恼”,其病因病机乃汗吐下后邪热乘虚郁于胸中、气机不畅。故仲景用豆豉取其清宣之意,配栀子轻苦泄热,二药共用,清宣互济、发郁热邪、清热除烦,组成清宣胸中郁热之良剂。若兼呕吐、少气等其他症状,则随症加味。后世用豆豉配栀子治疗胃痛、失眠等属热郁之证型者,收到较好的疗效。

补阳者,必于阴中求阳,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;善补阴者,必于阳中求阴,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”,“善治精者,能使精中生气;善治气者,能使气中生精”。这些精辟见解,被后人奉为理虚圭臬,形成独具特色的“燮理阴阳,取意于化”的制方原则,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制定了许多名方,如左、右归饮,左、右归丸,两仪膏,参术膏等。

左归饮乃壮水之剂,命门阴衰阳盛者宜之,方用熟地、山药、枸杞、甘草、茯苓、山茱萸;左归丸主证为精髓内亏、津液枯涸,方由左归饮减茯苓,加川牛膝、菟丝子、鹿角胶、龟板胶。饮与丸,皆在培左肾之元阴,惟饮速而丸缓,饮滋而丸补。右归饮乃益火之剂,命门

此外,仲景用豆豉与栀子同用,还治疗大病新愈、余热未尽之“劳复”(因劳而病复发)。劳复之病机,当为劳则气上、余热复集、郁于胸中,症见烦热懊恼、胸脘窒闷等,治宜清宣泄热。故仲景以枳实栀子豉汤主之。方中,豆豉配栀子,清宣上浮之热,使邪热从表而解;栀子配枳实,降气泄热。诸药并用,共奏宣散劳复发热之功。

二、清宣以催吐祛邪

豆豉轻清宣发,不仅可泄热解郁,且有向上催吐以祛邪之功,有时服之有欲吐之感。故仲景于《伤寒论》中用栀子豉汤一类方,方后即嘱“得吐后,止后服”。仲景还利用豆豉这一作用,治疗胸中痰食阻滞证,使邪因催吐而出。如《伤寒论》第166条云:“病如桂枝证,头不痛,项不强,寸脉微浮,胸中痞硬,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,此为胸有寒也。当吐之,宜瓜蒂散。”文中所谓“胸中痞硬,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”,即由痰食阻滞所致。瓜蒂散由瓜蒂、赤小豆、豆豉三味药组成。方中,瓜蒂吐胸中实邪,

阳衰阴盛者宜之,方用熟地、山药、山茱萸、枸杞、甘草、杜仲、肉桂、附子;右归丸乃为治元阳不足或先天禀衰而设,方由右归饮加鹿角胶、菟丝子、当归,减甘草。四方分别为治命门阴阳不同虚损而设,主证不同,然方中均有熟地、山药、枸杞子、山茱萸四味。旨在取其温柔之性以填精益阴,体现了景岳一贯主张的“阴为阳基”、“精中生气”的论治学思想。至如“两仪膏”以治精不化气,“参术膏”以疗气不化精,概皆基于阴阳互根之理,旨在燮理,意在求化所创制。

(作者简介:马照寰,男,51岁。现任河南中医学院成教部副教授。)